

广深产业联动共建世界级“双子城”的实证研究

□ 何颖珊, 向晓梅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 广东 广州 510635)

摘要:广州、深圳同为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发展核心引擎,如何持续释放广深“双城联动”的战略叠加效应和强大驱动效应,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战略意义。产业联动作为“双城联动”的关键一环,广州、深圳应加快构建基于比较优势、分工合理、良性竞合的现代产业体系,共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产业集群。本文基于产业联动的角度,尝试构建一个“整体—重点—细分”的分析框架,采用多重指标综合测度与比较分析方法,研究2000—2022年间广州、深圳产业联动发展水平及其动态演变特征。研究结果发现,随着产业的不断细分,广州、深圳的产业同构程度逐渐减小,产业区域分工和合作逐渐深化,初步形成了“大产业、细分工”的协同发展格局,并据此提出促进广州、深圳产业联动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双城联动”;产业联动;广州;深圳

中图分类号:F127;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714(2025)02-0010-06

An Empirical Study of Guangzhou-Shenzhen Industrial Linkage to Build World-Class “Twin Cities”

HE Yingshan, XIANG Xiaomei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Guang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510635,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Guangzhou and Shenzhen are both the core engines of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and long-term strategic significance to continuously release the strategic superposition effect and powerful driving effect of the Guangzhou-Shenzhen “dual city linkage”. Industrial linkage as a key part of the “dual city linkage”, Guangzhou and Shenzhen should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based on comparative advantages, reasonable division of labor, benign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and jointly foster world-class industrial clusters with global competitivenes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linkag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whole—key—subdivision” analysis framework, and adopts the comprehensive measurement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of multiple indicators to study the level of industrial linkage development and its dynamic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in Guangzhou and Shenzhen during 2000–2022.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with the continuous subdivision of industries, the degree of industrial isomorphism in Guangzhou and Shenzhen is gradually reduced, and the reg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operation of industries are gradually deepened, and a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attern of “large industry and fine division of labor” is initially formed. Based on thi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industrial linkage between Guangzhou and Shenzhen.

Keywords: “Dual City Linkage”; Industrial Linkage; Guangzhou; Shenzhen

一、引言

广州是国家中心城市、综合性门户城市、省会城市,深圳是经济特区、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国家创新型城市,两市同为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发展核心引擎、副省级城市、经济强市,在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中地位举足轻重。基于“双区”建设的历史机遇,如何充分释放广深“双城联动”效应,不仅是实施国家发展战略的迫切需要,也是广州、深圳“双子城”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广州、深圳“双城联动”具有多方面的内容,但产业联动并形成示范是“双城联动”的关键一环。广州、深圳应以产业联动作为先手,

通过高效的区域产业转移与对接合作,实现区域间产业的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促进产业链不断拓展延伸,加速引领广深“双城联动”向更高水平发展。

长期以来,广州、深圳之间表面上看相互竞争,实际上已经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广州、深圳如何通过双城联动加快互利共赢、协同发展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和思考。当前学术界关于广深“双城联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是关于产业竞合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们长期以来都十分关注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的问题,部分学者也延续这一视角对广深“双城联动”开展研究。

林晓燕从产业发展的角度对广深双核联动现状进行了分析,发现广深双核产业联动面临着交通一体化水平较低、科技创新合作不够等问题^[1]。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造了“产业—科技—金融—基础设施”多元系统,并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广深“双城联动”进行了测度^[2]。还有学者基于区域产业协同理论,对广深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发展的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若干针对性的对策建议^[3-4]。二是关于“双城联动”的理论研究。部分学者从“双城联动”的内涵、特征和模式切入,深入分析广深“双城联动”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理论基础,系统梳理广深“双城联动”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并提出广深“双城联动”的实施路径和政策建议^[5-7]。三是关于协同创新的研究。广深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两大区域创新中心,在科技创新方面各有优势,如何通过优势互补共建世界级创新平台,成为学者们探讨的又一重要问题。学者们围绕广深协同创新的现状、特征和面临挑战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双城”联动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的对策建议^[8-10]。四是关于府际关系的研究。地方政府是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力量,这意味着如何理解广深联动的政策转向及其背后的治理逻辑尤为重要。沿着这一思路,部分学者开始关注政策驱动下城市—区域关系的形成与演变。周寒指出广深联动本质上是城市—区域关系以及政府间关系的映射,伴随着广深联动的主要政策变迁,城市间关系呈现出新特征^[11]。杨爱平等构建了广深城际关系嬗变的三阶段模型,指出地方政府政策调整是广深城际关系从“龙头之争”到“错位发展”再到“双城联动”的重要驱动力^[12]。

从已有文献来看,关于广深“双城联动”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同时大多数文献集中于定性研究,定量分析广深联动的文献较少,缺乏数据及实证检验支撑。本文基于产业联动的角度,尝试构建一个“整体—重点—细分”的分析框架对广深产业联动水平及其演变进行测度,进而提出推动广深产业联动的对策建议,为政府实现广深“双城联动”提供决策参考。

二、产业联动的测度方法

克鲁格曼指数、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以及区位熵均是衡量产业分工和合作的常用指标。其中,克鲁格曼指数直接反映区域产业的专业化分工程度,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反映区域产业的同构程度,二者从正面和侧面共同测度了区域产业联动,故将二者进行融合,构造产业联动指数,以综合测度广深的产业联动水平。区位熵能具体测度某个细分行业的专业化水平,故在产业联动指数的综合分析基础上,进一步运用区位熵分析广深的专业化产业。

1. 克鲁格曼指数

克鲁格曼指数又称专业化指数,这一指数主要通过测度地区间产业结构差异来反映地区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克鲁格曼指数通常介于0和2之间,该指数取值越大,表示两个地区间行业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越高,由地区间专业化分工而造成的区域产业结构差异程度则越大,反之则越小。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K_{ij} = \sum_{k=1}^n \left| \frac{Q_{ik}}{Q_i} - \frac{Q_{jk}}{Q_j} \right|$$

其中, K_{ij} 为地区*i*和*j*之间的克鲁格曼指数, k 表示产业, Q_{ik} 和 Q_{jk} 分别表示产业*k*在地区*i*和*j*的产出数量或从业人数, Q_i 和 Q_j 分别表示地区*i*和*j*的总产出数量或从业总人数。

2. 产业结构相似系数

产业结构相似系数最早由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提出,目前已成为衡量地区间产业结构同构程度的重要指标。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产业结构相似系数被广泛运用于产业同构程度的测算,尽管相似系数本身只能对地区间产业结构做静态比较,但通过比较该系数在一段时期内的变化趋势,能获得地区间产业结构在时间上趋同或趋异的信息。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变大意味着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问题加剧,反之则变小。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S_{ij} = \frac{\sum_{k=1}^n (X_{ik} X_{jk})}{\sqrt{\sum_{k=1}^n X_{ik}^2} \sqrt{\sum_{k=1}^n X_{jk}^2}}$$

其中, S_{ij} 为地区*i*和*j*之间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 k 表示产业, X_{ik} 表示产业*k*在地区*i*占整个产业的比重, X_{jk} 表示产业*k*在地区*j*占整个产业的比重。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在0和1之间变动,该系数越趋近于1,表明区域间产业结构相似程度越高,也就意味着该产业区域间分工程度越低,反之亦然。其中,若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为0,则代表两个地区行业结构完全不同;若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为1,则代表两个地区行业结构完全相同。

3. 产业联动指数

由于测度地区间产业联动水平的方法和指标不止一种,并且不同指标的测度重点和灵敏度有所不同,为避免因选取指标单一而导致研究结果不客观、不全面的问题,本文同时采用克鲁格曼指数和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两项指标,通过构造产业联动指数综合测度广州、深圳的产业联动水平。其中,克鲁格曼指数是衡量产业联动程度的正向指标,即克鲁格曼指数越大,产业专业化分工水平越高,产业联动水平越高。而产业结构相似系数是测度产业联动程度的逆向指标,指数越大表明产业同构程度越高,产业联动水平越低,故需做指标正向化处理,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bar{S}_{ij} = \frac{\max(S_{ij}) - S_{ij}}{\max(S_{ij}) - \min(S_{ij})}$$

$$L_{ij} = \frac{K_{ij}}{2} + \frac{\bar{S}_{ij}}{2}$$

其中, $\bar{S}_{ij}$ 为进行指标正向化后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取值范围介于0和1之间。在此基础上,将 $\bar{S}_{ij}$ 与 K_{ij} 按照各50%的权重进行加总得到产业联动指数 L_{ij} 。

4. 区位熵

区位熵是评价区域优势产业的基本测算方法,也是衡量不同区域各产业集聚水平的常用指标。区位熵本质上体现了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涵,反映了各区域在各行业上参与区际贸易的竞争能力,在一段时期的区位熵比较中能够显示区域间贸易格局的变动趋势。区位熵通过对某地区某行业的产出水平在集聚度

上与全省比较,反映该地区该行业相对于全省平均水平是否具有专业化优势。若区位熵取值大于1,则表明该地区该行业集聚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该地区该行业相对于全省具有专业化优势,反之则无。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LQ_{ik} = \frac{Q_{ik} / \sum_{k=1}^n Q_{ik}}{Q_k / \sum_{k=1}^n Q_k}$$

其中, LQ_{ik} 为产业 k 在地区 i 的区位熵, Q_{ik} 为产业 k 在地区 i 的总产出数量或从业总人数, Q_k 为行业 k 在全省的总产出数量或从业总人数。

尽管区位熵指标可以找出某地区相对于全省的专业化优势产业,但没法对地区间的专业化优势行业进行比较。为了判断不同产业在地区间的专业化分工程度,本文构建了区位熵比值这一指标,用以测度地区间产业的比较优势。若比值大于1,表明 i 地区在该行业上相对于 j 地区具有比较优势;若比值小于1,表明 i 地区在该行业上相对于 j 地区具有相对劣势;若比值接近于1,表明 i 地区和 j 地区在该行业优势相当。设定 LQ_{ij}^k 为产业 k 在地区 i 和 j 之间的区位熵比值,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LQ_{ij}^k = \frac{Q_{ik} / \sum_{k=1}^n Q_{ik}}{Q_{jk} / \sum_{k=1}^n Q_{jk}}$$

三、广深产业联动的实证分析

广深产业联动的实证分析采用“整体—重点—细分”的分析框架:“整体”即从宏观层面分析广深三次产业的联动水平;“重点”即从中观层面分析广深制造业的产业联动水平;“细分”即从微观层面分析广深制造业联动的具体专业化产业。数据来源于历年《广东统计年鉴》《深圳统计年鉴》《广州统计年鉴》,并且仅选择在广州、深圳独立统计并且共同拥有的34个制造业细分行业。

1. 基于三次产业宏观层面的产业联动程度分析

为了对广州、深圳产业联动的整体情况有一个初步了解,本文首先运用产业联动指数,从三次产业宏观层面对广深产业联动水平及其动态演变进行分析。从图1可以看出,2022年广深三次产业联动指数为0.233269769,表明广州、深圳三次产业联动程度较低,三次产业分工不明显,存在较为严重的产业同构现象。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广州、深圳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三次产业结构从“二三一”向“三二一”转变。2022年,广州三次产业结构为1.1:27.4:71.5,深圳三次产业结构为0.08:37.9:62.02,第三产业占比超过第一、二产业,占据半壁江山。从动态演进来看,2000—2005年广深三次产业联动指数快速上升至最高值0.639656534,随后逐步下降至2014年的最低值0.080588805。2014—2019年,广深三次产业联动指数再次上升至0.2995006,但从2019年开始又有所下降,整体在0.2—0.3范围内波动。由此可见,2000—2022年广深三次产业联动指数的平均值为0.251684956,产业联动水平整体较低,呈现三次产业同构程度较高、产业互补性有待增强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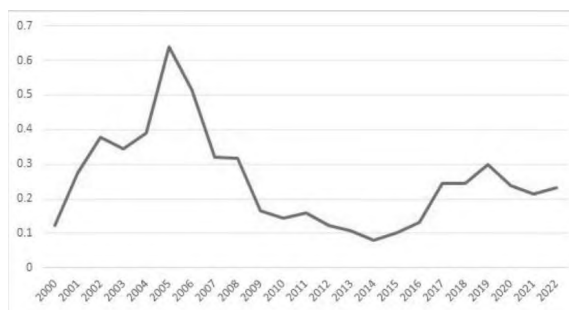


图1 2000—2022年广深三次产业联动指数

然而,由于三次产业分类的宽泛性,上述指标并不能在较大程度上辨出产业分工的实际情况。广州、深圳处于同一发展阶段,其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必然具有很高的相似性,大分类的产业结构必然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事实上,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和国际产业分工不断深化,城市间的分工模式从最初的产业间分工,演进为产业内分工,再到产品内分工,从而导致不同地区间产业结构可能存在着“大同小异”。因此,不同地区间三次产业结构趋同并不表明其必然不利于地区优势互补和分工协作,而且产业结构趋同某种程度上可以形成产业集群,为区域间开展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创造良好条件。为此,本文进一步展开中观层面的产业联动分析。

2. 基于制造业中观层面的产业联动程度分析

广州、深圳作为广东制造业发展的核心区域,始终坚持以实体经济为本,大力发展制造业。因此,制造业是广深产业联动的重点所在。本文运用产业联动指数,从制造业中观层面进行深入分析,力求在整体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广深制造业的产业联动发展水平。从图2可以看出,2022年广深制造业产业联动指数为0.773731284,表明广深在制造业层面已形成一定的互补性产业分工,并没有出现严重的制造业同构现象。从动态演进来看,2001—2004年广深制造业产业联动指数逐步下降至0.554965653,随后快速上升至2007年的最高值1.077687786。2007—2012年,广深制造业产业联动指数再次下降至0.586794889,随后在0.5—0.7范围内波动。2015—2020年,广深制造业产业联动指数从0.543781423上升至1.054839369,随后有所回落,但仍保持在较高水平。由此可见,2000—2022年广深制造业产业联动指数平均值为0.770365105,总体维持波动上升趋势,呈现制造业产业联动程度加强、专业化分工有待提升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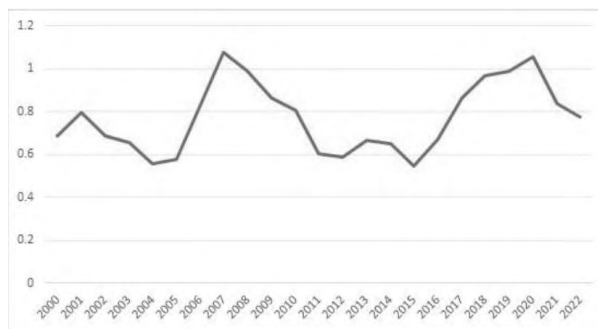


图2 2000—2022年广深制造业产业联动指数

通过对比图1和图2可以发现,广深制造业产业联动指数远高于同时期的广深三次产业联动指数,这表明虽然广州、深圳三次产业宏观层面的产业同构现象明显,但制造业中观层面的产业同构现象大大降低,区际产业联动水平显著提高。

3. 基于细分行业微观层面的产业联动程度分析

本文运用区位熵和区位熵比值具体分析广深34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专业化程度,找出广州和深圳的比较优势行业,为两地开展产业合作和实现联动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广州和深圳比较优势行业的动态演变。

①专业化产业的识别。区位熵能识别出广州和深圳在全省具有比较优势的专门化部门,反映特定行业的专业化水平,区位熵大于1的产业即为地区优势产业。2022年,广州和深圳34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区位熵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2022年广州共有14个行业的区位熵大于1,按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为:汽车制造业(4.22),燃气生产和供应业(3.13),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3.09),烟草制品业(3.08),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2.66),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2.32),医药制造业(2.01),食品制造业(1.95),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1.58),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1.39),家具制造业(1.28),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1.16),水的生产和供应业(1.16),通用设备制造业(1.05)。这些都是广州具有比较优势和专业化程度相对较高的行业,其中汽车制造业区位熵值(4.22)非常高,这与广州汽车之都的地位相吻合,是广州的第一大支柱产业。2022年广州区位熵最低的五个行业分别为:其他制造业(0.26),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0.28),化学纤维制造业(0.35),金属制品业(0.35),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0.42)。这些都是广州制造业中最大的劣势行业,专业化程度较低。

2022年,深圳共有5个行业的区位熵大于1,按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2.14),其他制造业(2.12),仪器仪表制造业(1.68),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1.66),专用设备制造业(1.55)。这些是深圳具有比较优势和专业化程度相对较高的行业。而区位熵最低的五个行业分别为:化学纤维制造业(0.005),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0.03),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0.03),食品制造业(0.14),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0.15)。这是深圳专业化程度最低的五个行业。

2022年,广州共有26个行业的区位熵大于深圳(区位熵比值大于1),占比约76.5%,表明广州在大多数制造业行业相对于深圳具有比较优势。其中,有19个行业的区位熵比值大于2,按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为:化学纤维制造业(70),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38.67),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17.67),食品制造业(13.93),家具制造业(8),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7.54),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6.62),汽车制造业(5.94),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5.22),燃气生产和供应业(5.05),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4),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3.65),农副食品加工业(3.21),烟草制品业

(3.18),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2.93),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2.87),造纸和纸制品业(2.47),纺织业(2.42),医药制造业(2.34)。这些是广州相对于深圳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行业部门。

2022年,广州有8个行业的区位熵小于深圳(区位熵比值小于1),其中其他制造业(0.12),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0.17),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0.2),专用设备制造业(0.46)等行业的区位熵比值小于0.5。这表明相对于深圳,广州在上述行业的劣势越发明显。此外,有11个行业区位熵比值的取值范围在0.5和2之间,其中金属制品业(1)、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0.92)、通用设备制造业(1.18)等行业的区位熵比值接近1,表明广州、深圳在上述行业的比较优势差别不大。

通过上述分析可发现,广州、深圳在制造业34个细分行业的专业化程度各不相同,城市之间具有其独特的比较优势产业,这为广州和深圳的产业互补和联动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表1 2022年广州、深圳制造业分行业区位熵比较

行业	区位熵		区位熵 比值
	广州	深圳	
农副食品加工业	0.77	0.24	3.21
食品制造业	1.95	0.14	13.93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2.32	0.58	4
烟草制品业	3.08	0.97	3.18
纺织业	0.46	0.19	2.42
纺织服装、服饰业	0.71	0.36	1.97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0.73	0.20	3.65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0.43	0.15	2.87
家具制造业	1.28	0.16	8
造纸和纸制品业	0.47	0.19	2.47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0.66	0.72	0.92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0.28	1.66	0.17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1.16	0.03	38.67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39	0.21	6.62
医药制造业	2.01	0.86	2.34
化学纤维制造业	0.35	0.005	70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0.69	0.51	1.35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68	0.35	1.94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0.53	0.03	17.67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0.99	0.57	1.74
金属制品业	0.35	0.35	1

↓ 接下表

↑ 接上表

通用设备制造业	1.05	0.89	1.18
专用设备制造业	0.71	1.55	0.46
汽车制造业	4.22	0.71	5.94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2.66	0.51	5.22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0.47	0.70	0.67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0.42	2.14	0.20
仪器仪表制造业	0.93	1.68	0.55
其他制造业	0.26	2.12	0.12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0.45	0.71	0.63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3.09	0.41	7.54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58	0.54	2.93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3.13	0.62	5.05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16	0.72	1.61

数据来源:根据《2023年广东统计年鉴》计算

②专业化产业的演变。为进一步分析2011—2022年间广州、深圳上述主要专业化产业的动态演变,本文借鉴李学鑫(2007)的研究方法,对区位熵的变化值进行分析,其中 L_0 为2011年区位熵, L_1 为2022年区位熵, ΔL 为区位熵变化值,依据区位熵的变化可将广州、深圳的专业化产业分为四类: $\Delta L > 0$ 、 $L_0 < 1$ 、 $L_1 > 1$,表明比较劣势转化为比较优势,即比较优势形成的产业; $\Delta L > 0$ 且 $L_0 > 1$ 为比较优势增强的产业; $\Delta L < 0$ 且 $L_1 > 1$ 为比较优势减弱的产业; $\Delta L < 0$ 、 $L_0 > 1$ 、 $L_1 < 1$,表示比较优势丧失的产业。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行业由于本身并不具备专业化优势($L_0 < 0$),故不属于上述分类中的任一类。

广州比较优势形成的产业包括家具制造业(0.74)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0.35)。广州比较优势增强的产业包括食品制造业(0.04)、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0.56)、烟草制品业(0.21)、医药制造业(0.85)、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1.11)、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1.26)、燃气生产和供应业(1.26)、水的生产和供应业(0.35)。广州比较优势减弱的产业包括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0.18)、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0.81)、通用设备制造业(-0.09)、汽车制造业(-0.28)、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0.03)、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0.12)、其他制造业(-0.07)。广州比较优势丧失的产业包括农副食品加工业(-0.32)、纺织服装、服饰业(-0.32)、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0.83)。

深圳比较优势形成的产业是其他制造业(1.24),而比较优势增强的产业则是专用设备制造业(0.26)。深圳比较优势减弱的产业主要包括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0.2)、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0.36)、仪器仪表制造业(-0.29),而比较优势丧失的产业则是水的生产和供应业(-0.84)。

表2 2011—2022年广州、深圳专业化产业的变动情况

行业	广州			深圳		
	2011	2022	变化值	2011	2022	变化值
农副食品加工业	1.09	0.77	-0.32	0.34	0.24	-0.1
食品制造业	1.91	1.95	0.04	0.19	0.14	-0.05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76	2.32	0.56	0.42	0.58	0.16
烟草制品业	2.87	3.08	0.21	0.71	0.97	0.26
纺织业	0.79	0.46	-0.33	0.11	0.19	0.08
纺织服装、服饰业	1.03	0.71	-0.32	0.36	0.36	0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0.80	0.73	-0.07	0.37	0.2	-0.17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0.38	0.43	0.05	0.10	0.15	0.05
家具制造业	0.54	1.28	0.74	0.54	0.16	-0.38
造纸和纸制品业	0.49	0.47	-0.02	0.41	0.19	-0.22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0.52	0.66	0.14	0.82	0.72	-0.1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0.47	0.28	-0.19	1.86	1.66	-0.2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1.34	1.16	-0.18	0.03	0.03	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20	1.39	-0.81	0.21	0.21	0
医药制造业	1.16	2.01	0.85	0.87	0.86	-0.01
化学纤维制造业	0.28	0.35	0.07	0.05	0.005	-0.045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0.66	0.69	0.03	0.73	0.51	-0.22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27	0.68	0.41	0.33	0.35	0.02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36	0.53	-0.83	0.12	0.03	-0.09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0.64	0.99	0.35	0.38	0.57	0.19
金属制品业	0.49	0.35	-0.14	0.49	0.35	-0.14
通用设备制造业	1.14	1.05	-0.09	0.86	0.89	0.03
专用设备制造业	0.63	0.71	0.08	1.29	1.55	0.26
汽车制造业	4.50	4.22	-0.28	0.26	0.71	0.45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2.69	2.66	-0.03	0.35	0.51	0.16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0.46	0.47	0.01	0.73	0.7	-0.03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0.54	0.42	-0.12	2.50	2.14	-0.36

↓ 接下表

↑接上表

仪器仪表制造业	0.76	0.93	0.17	1.97	1.68	-0.29
其他制造业	0.33	0.26	-0.07	0.88	2.12	1.24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0.29	0.45	0.16	0.01	0.71	0.7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1.98	3.09	1.11	0.64	0.41	-0.23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20	1.58	0.38	0.69	0.54	-0.15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1.87	3.13	1.26	0.54	0.62	0.08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81	1.16	0.35	1.56	0.72	-0.84

数据来源:根据《2012年广东统计年鉴》和《2023年广东统计年鉴》计算

四、推进广深产业联动的政策建议

1. 推动区域产业互补合作,共建世界级产业集群

发挥广深两地产业门类齐全、比较优势相对突出的特点,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超高清视频显示等重点产业,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提升区域产业开放性和协作性,形成层次分明、分工合理、优势凸显的产业协同发展体系。针对两地各具绝对优势类的产业,应采取产业间分工模式,充分发挥核心城市产业基础实力雄厚的优势,加快引进、培育一批大企业,搭建产业发展大平台,进一步做大做强区域特色优势产业。针对两地各具比较优势类的产业,应坚持产业链分工模式,完善广深两地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跨区域产业链联合链长制,推动上下游协作配合的资源整合和产业链条建设。组建重点产业的跨区域产业联盟,推动产业链精准对接和循环畅通。

2. 完善区域合作机制,强化两地政府协同共进力度

健全统筹组织和协调推进机制,成立广深双城产业协作专项合作组,建立产业协同发展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专题联席会议,共同研判产业发展趋势,协调解决产业协同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强化产业协同规划,以“错位发展,平衡发展”为导向加强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加强两地产业发展规划对接,建立健全统一编制、联合批报、共同实施的产业规划管理体制,加快出台《广深制造业协同发展规划》《广深重点产业产业链图谱》《广深制造业协同发展实施方案》等系列重大政策文件,并分行业分阶段明确短中长期产业协同发展的目标和路线图。积极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进一步完善成本共担和利益共享激励机制,加紧制定跨区域合作项目财税分享细则和经济指标分算政策。

3. 建设区域产业合作园区,打造产业联动的先导示范窗口

以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等重大平台为引领,以多个特色产业园区为多点支撑,推动产业园区加强合作,共建一批具有带动作用 and 承载作用的“广深产业合作园”,构建多层次平台共同支撑的产业生态圈,进一步发挥产业平台支撑产业发展的潜能。广州、深圳应尽快启动建设“广深产业合作园”项目磋商和具体行动,并就项目选址、共建模式、产业布局、激励机制等形成共识,

推动“广深产业合作园区”尽快落地,发挥其在广州、深圳“双城联动”发展中的先导性、示范性作用,引导更多广深企业向园区集聚发展。建立产业园区协同联动有效机制,共同谋划和推进重大产业项目、重大市场开拓等事项,促进广深产业园区协同发展。

4. 提升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破除要素自由流动的瓶颈障碍

加快广深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进程,推动边界地区“无缝衔接”,打通交通“大动脉”,携手共建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加强两市综合交通基础设施规划衔接,共同推动广深第二高铁、深莞增城城际等重大项目建设,实现高速铁路、城际轨道和高等级公路等多种交通方式直达互通,打破双城联动的空间距离感。促进两市机场和临空经济协同发展,强化港口体系建设并发展多式联运。畅通区域要素流动和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探索有利于资金、知识、技术、信息、人才等要素高效便捷流动和区域融通融合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打破地区间要素流动障碍,以要素市场一体化促进广深产业联动发展。●

参考文献:

- [1]林晓燕.打造世界级“双子星”城市:广深双核产业联动现状及问题研究[J].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学报,2024,18(01):58-64+79.
- [2]林晓燕.打造世界级“双子城”:广深“双核联动”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研究[J].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4,40(01):11-18.
- [3]陈黎,盛秀婷,吴岩.区域产业协同视角下广深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22,42(19):199-206.
- [4]王欢,王陶冶,杨勇,等.发挥广深双城双区效应大力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发展[J].广东科技,2021,30(05):50-53.
- [5]徐常建,魏小飞.大湾区建设中的广深联动:条件与路径[J].开放导报,2022(01):104-112.
- [6]覃成林.广深在大湾区建设中的双城联动[J].开放导报,2021(04):46-52.
- [7]陈朋亲,毛艳华,荣健欣.城市群“双城”联动的理论逻辑与实践策略——以粤港澳大湾区广州、深圳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21,28(12):110-117.
- [8]丁焕峰,周锐波,刘小勇.广深“双城”联动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战略[J].城市观察,2021(01):7-22.
- [9]史欣向,李善民,李胜兰.广深充分释放“双城”联动效应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研究[J].城市观察,2021(03):60-74.
- [10]蔡丽茹,谷雨.“双核联动”背景下的广深高校科研院所创新联系现状、问题与对策[J].广东科技,2020,29(12):53-56.
- [11]周寒.从增长竞合到统筹协调的城市-区域发展——基于广深联动的政策分析[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02):51-62+206.
- [12]杨爱平,萧宇雄,周品仪.政策驱动之中国城际关系嬗变的三阶段模式——以广深两地城际关系互动变迁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22,29(04):9-15.

基金项目: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羊城青年学人项目“广深合作推进建设世界级‘双子城’研究——基于产业联动的视角”(2022GZQN09)。

作者简介:

何颖珊(1987-),女,汉族,广东中山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区域经济。

向晓梅(1965-),女,汉族,四川宜宾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产业经济、海洋经济。

收稿日期:2024-07-10